



[综合] “和刻本”与“华刻本”

王勇

来源:

投稿人: rbs

发布时间: 2008-2-25

阅读次数: 613

“和刻本”与“华刻本” “和刻本”这个词儿，读者一定感到眼生，《辞海》、《词源》未收，在《汉语大字典》里也找不到。我的同事王宝平教授，大约十年前出版了近600页的大著，书名取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（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2月），让他后悔了好一阵子。为什么呢？摆在书店里或者架藏于图书馆，前去寻找日本研究图书的读者，瞥一眼就离开，因为很多人把“和”误作连词，以为是“中国馆藏与刻本的汉籍书目”。

至于“华刻本”，很多人还是第一次看到，目前任何辞典均没有收录，光看这三个字，大概也会产生种种错觉。也难怪，这是笔者在构建“书籍之路”思路时，应需而创的新词，虽然诞生至今也有十载，毕竟还没有被世间普遍认同。

我把这两个冷僻的词汇用作题名，并非仅仅为了猎奇，在研究中日书籍交流之时，这是一对孪生兄弟，正好相互匹配，彼此印证。

一、和刻本定义

查阅国内的文献学、图书馆学、版本学的相关著作和辞书，谈到日本刊刻的书籍，习称之为“东洋本”或“日本本”，前者属落后于时代的旧名，弃之不用也罢；后者“本本”连缀，读来拗口，也不见得合适。那么该如何称呼呢？鲁迅先生提倡“拿来主义”，日本就有个现成的“和刻本”，大可“拿来”用之。

“和”者，“倭”也。在日本古代文献中，“和”与“倭”皆音读“わ”，“大和”与“倭”同训作“やまと”。日本人讨厌“倭”字，《旧唐书》（日本国传）云：“倭国自恶其名不雅，改为日本。”说明此风由来已久。古代称丑女为“倭傀”，也难怪他们。

据说从武则天朝开始，日本基本绝用“倭”字，于是“倭歌”变成“和歌”，“倭族”改为“和族”（即当今的“大和民族”），“倭刀”易名“日本刀”。有趣的是，早年用日本的电脑打“倭寇”这个词，居然遍寻不着，只跳出个“和寇”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这是题外话，举这个例子，只想说明：如果写成“倭刻本”，就不会招致诸多误会，这个专业词汇也许早在中国生根了。杨守敬刻过一本《和名类聚抄》，外行人不知道这是本日本古字典，如果他用原来的书名《倭名类聚抄》，大概情况要好些。

言归正传。“和刻本”顾名思义，当指日本刊刻的书籍。但这样解释太过笼统，严格点说，容易误人于歧途。首先，用日本文字（即“假名”）写成的书籍，不能称和刻本；其次，日本人用汉字撰著的书籍，也不算和刻本。所谓和刻本，专指日本刊刻的中国典籍。

即便是“日本刊刻的中国典籍”，按照长泽规矩也所下的定义，还要继续细化。首先，同样是中国典籍的再版，和刻本与翻刻本不同。长泽博士认为，翻刻本必须是中国刻本的再刻，和刻本就没有这个限制，隋唐以来传入日本的写本，如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、《论语义疏》、《群书治要》等在日本首刻，即可归入和刻本范畴。其次，和刻本与清刊本有所区别，明治时期寓居日本的清人，他们的著述由日本人付之枣梨，划为和刻本，如《蘅华馆诗录》、《舟江杂咏诗》等；倘若自行雕版梓行，便算清刊本，如《敝扫斋主人年谱》、《古逸丛书》之类。

长泽规矩也的定义十分精细，但未必可行。同一个人的著作，同样在日本刊印，这些书籍即便使用相同的纸张、一样的技术、同一批刻工，仅仅出资方不同而分为两类，有点牵强附会，可操作性较低。如果中日共同出资又如何呢？许多事情模棱两可，实在难以一分为二。分辨翻刻本与和刻本更难，长泽规矩也认为：中国典籍的白文再刻本当属翻刻本，再刻时字里行间添加训点、假名则列为和刻本。

可是，有些书籍本文一依中国原样，但有些头注、旁批之类，又该如何判别？长泽规矩也将之定为和刻本。我们在国内图书馆调查和刻本时，发现要准确辨识批注系原本所有，还是再刻者添加，对斯道专家也非易事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日本再刻时添加的音符、头注、旁批、释语，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，便不能称之为和刻本了，长泽规矩也称曰“日本汉籍”，归入日本人的著述。这个尺寸不好把握，依样画葫芦的是翻刻本，翻刻者加了些符号、注语摇身一变成了和刻本，这些辅助性内容多了就算日本汉籍。长泽规矩也坦言：

日本人在本文内插入注释、校语者，太宰春台的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尚可判明，《扬州十日记》因插入部分很少，

就不易辨识。……至如《文章轨范》、《唐宋八家读本》之类，如不与中国刻本逐一对照，难以归属。

此外，长泽规矩也把书名添加“改订”、“增补”、“重订”、“新刊”、“集注”、“景印”之类冠辞的，统统划归“日本汉籍”，而有些书名未改但批注更多的则辑为和刻本。诸如此类，长泽规矩也所定的和刻本定义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譬如，我们在中国图书馆调查时发现，有些本子粗看完全符合和刻本要求，但细检却发现，有的删去数节，有的增添一章，有的插入几页，有的添加图板，花样百出，不一而足，令著录者茫然无从。极端的例子，如《海外奇谈》，扉页上注明是清刻本，而中国从未雕版上梓此书，原来是日本书贾为射利做的手脚。

大凡翻刻某书，即使依样画葫芦，要做到与原本完全相同是困难的，有意无意地会加入翻刻者的创意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因此笔者建议：凡以原本内容为主，基本保持原书构架，辅助性的训点、注释、批语、评述、序言、跋语无论多寡，甚至结构略有变动，均归入和刻本范畴；如果对原文的注释、改编、校勘、评述比重很大，尤其是评注等用汉字夹带假名写成，达到“反客为主”的程度，则不妨算作日本汉籍。

二、和刻本源流

如果把东传日本的中国典籍比喻为移民，那么和刻本便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……移民（按照土著化程度的不同，出现覆刻本、白文本、句读本、训点本、注解本、评释本等等），乃至出现中日混血的所谓“日本汉籍”（为了区别于纯粹的日本汉籍，也有人称之为“准汉籍”）。

可以说，和刻本是东传汉籍的变体，是日本移植中国文化的方式；既与中国典籍具有学缘关系，又带着日本的风土人情气息，堪称中日书籍交流乃至文化交流的实证资料。关于和刻本的起源，严绍璵教授有一段简明扼要的论述：

和刻本汉籍若以“内典”计，最早大约发端于八世纪的“百万塔本”《陀罗尼经》，距今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；若以“外典”计，大约起自十三世纪的“陋巷子本”《论语集注》，距今有七百年的历史。

千有有余年来，和刻本形成一个独特而又庞杂的版本系统，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，营造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，独创出一种吸收外来文明的有效机制。和刻本按照日本文献学的分类，一般平安时代以前称“古刊本”，镰仓~室町时代称“五山版”，江户时代前期称“古活字版”，江户时代后期至明治时期通称“和刻本”。

在和刻本的历史上，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，“五山版”是比较珍贵的，因为古刊本存世极少而五山版数量较多，而且五山版的底本多为宋元刊本，又有元代刻工（总数超过100人）东渡相助，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珍本和风格。

不过就数量而言，江户时代无疑是和刻本的辉煌时期。这一时期，清朝的贸易商船将大量中国书籍运往日本，大庭修博士称之为“唐船持渡书”，据统计正德四年（1714）至嘉永元年（1848）的134年间，有稽可查的就有12447部书传到日本，文献失载的估计更多。那么，这些书中又有多少在日本被“和刻”呢？下面以医书为例，做进一步探讨。

据真柳诚、友部和弘编订的《中国医书渡来年代总目录（江户时代）》，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中国各类医书将近1000种，这个数字不包括重复传入，含卷帙浩繁的丛书类，所以卷数当以万计。真柳诚从中选出314种，分成医方、本草、伤寒、金匱、内经、针灸、痘疹6类，统计出各类医书的翻刻频率。（参见表1）

（表1）中国医书和刻次数与频率和刻本	医方类	本草类	伤寒类	金匱类	内经类	针灸类	痘疹类	合计
书目数	207	25	27	3	14	14	24	314
和刻次数	411	53	70	16	60	39	31	680
和刻频率	2.0	2.1	2.6	5.3	4.3	2.8	1.3	2.2

从上表可知，江户时代传到日本的医书，平均每每种被翻刻2.2次，其中金匱类和内经类分别达到5.3次和4.3次，这是因为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少数几种舶载书被反复刊刻的缘故；相比之下，医方类、本草类、痘疹类东传的种类较多，每种书的翻刻频率也就比较低。

中国书籍传到日本后，便是以和刻本的形式大量繁殖后代，源源不断地为彼国输送精神养料，刺激着日本人的文化创造活动。不可忽视的是，到了清末至民国时期，中国的一些宋元古本及明清珍本，因种种原因在国内散逸不存，独依和刻本得以传世。于是就有了一批文人志士，东渡日本访求佚书的壮举。

据王宝平教授所编的《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》，国内68家主要图书馆收藏的和刻本共计3063种，分别为经部592种、史部352种、子部1516种、集部598种、丛书5种。

三、华刻本发凡

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，对日本汉籍的西传作些考察。

日本汉籍西传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唐代。8世纪中叶以降，圣德太子的《法华义疏》、《胜鬘经义疏》，石上宅嗣的《三藏赞颂》，淡海三船的《大乘起信论注》、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，最澄的《显戒论》等，先后由遣唐使及入唐僧带到中国，引起过不大不小的反响。

五代至宋代，日本汉籍的西传达到一个高潮，这是因为唐末以来国内典籍散毁严重，中国开始向日本购求佚书。吴越国时期，日延从日本传回的佛教书籍约500卷，相信大多被及时抄写甚至雕版刊刻。北宋时遵式覆刻日本传回的《方等三昧行法》时撰写序文：

山门教卷，自唐季多流外国，或尚存目录而莫见其文。学者思之，渺隔沧海。《方等三昧行法》者，皇宋咸平六祀（按：1003年）日本僧寂昭等贡至，虽东国重来，若西乾新译。载披载沃，适奉醍醐。

不唯中国佚书被大量翻刻，一些入籍日本的宋僧语录，也由其日本弟子编集后带入中国镂板刊印的。如兰溪道隆的弟子汇编乃师“上堂、入室、普说、小参等语篇”而成《大觉禅师语录》，宋景定三年（1262）挟之入临安，求得上天竺寺法照序、净慈寺智跋，于景定五年（1264）在绍兴府开板付印。到了清代，日本人撰写的著作也有在中国镌刻行世的，比较著名的是山井鼎撰、物观补的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。

于是引发一个问题：中国典籍在域外的翻刻本，我们习惯上以翻刻地的国名称之，如日本翻刻本称“和刻本”，越南翻刻本称“安南本”，朝鲜翻刻本称“高丽本”等等。那么，中国翻刻的域外汉籍，我们该如何定名呢？翻阅国内外的专业工具书，迄今尚无相应的命名，于是笔者参照和刻本的定义，暂称之为“华刻本”。

当然，“华刻本”不仅仅为了对应“和刻本”而创制，凡域外人撰述而在中国刊刻的，不论作者的国别，理论上均应涵盖在内。试以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）为例，看看中国丛书收录域外典籍的情况。在38891种子目中，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的典籍——即被刻入中国各类丛书的和刻本共有89种，其中经部6种、史部53种、子部21种、集部9种，另有12种整套丛书。

刻入日本汉籍的中国丛书，有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函海》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、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、《榕园丛书》、《文选楼丛书》、《吉石斋丛书》、《小学钩沉续编》、《渐学庐丛书》、《殷礼在斯堂丛书》、《辽海丛书》、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、《雪堂丛刻》、《申报馆丛书》、《古逸丛书》、《滂喜斋丛书》、《会稽徐氏初学堂群书辑录》、《美术丛书三集》、《中国医学大成》、《珍本医书集成》、《三三医书》、《国医小丛书》、《针灸丛刊》、《古本医学丛刊》、《中外医书八种合刻》、《回澜社医书》、《白芙堂算学丛书》、《豫恕堂丛书》、《昭代丛书》、《柳堂师友录初编》、《销夏录书》。

上述31种丛书收入日本汉籍67种，往往一种丛书收入多种日本汉籍，而一种日本汉籍又被复数丛书刻入。此外，还有3种丛书整套在中国翻刻，即林衡辑《佚存丛书》（子目17种），神田喜一郎辑、陆志鸿编《敦煌秘籍留真谱新编》（子目34种），佚名氏辑《八史经籍志》。

我对医书作过专项统计，发现数量比较多，仅陈存仁辑的《皇汉医学丛书》（上海世界书局，1936年），收入日本医书86种282卷，部头最大的是多坚元裔撰《中国医籍考》80卷。日本医书的大量回馈，与他们曾经大量输入中国医书有关，茅元仪《武备志》（卷二百三十一）“古书”条记日本购书嗜好：

“五经”则重《书》、《礼》，而忽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；“四书”则重《论语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，而恶《孟子》；重佛经，无道经；若古医书，每见必买，重医故也。

在收集华刻本的过程中，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：西方人的汉文著作该如何处置？其数量较多，对近代影响也大，不可等闲视之。如王锡祺编刊的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（1891年），包括《补编》（1894年）、《再补编》（1897年），采书1433种，收入域外汉籍75种，分布如表2：

（表2）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中的华刻本国别分布

东方	西方
日本	朝鲜 美国 英国 葡萄牙 德国 俄国 泰西
29种	3种 16种 14种 2种 1种 1种 9种
32种	43种
共75种	

西方人43种领先于东方的32种，当然这与丛书的性质（注重西学）有关，但西方人的汉文著作之影响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。西人的汉文著作虽然多在中国原刻，而且大多经华人翻译或润色，但纳入广义的和刻本，我看也无妨。

综上所述，把华刻本作为一个独立的版本系统来研究，可以从中揭示中外文化交流中易为我们忽视的一个重要层面，即中国文化通过输出书籍贡献于世界文化的同时，也积极吸收域外汉籍的养分来不断充实自己。

四、《万国史记》琐谈

笔者自10年提出华刻本的概念后，一直断断续续地从事资料收集工作，近年还组织研究生对一些重要书目进行专题调查，下面以冈本监辅的《万国史记》为例，具体看看华刻本的创意何在。

据王宝平教授主编的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》（杭州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2月），国内有二种《万国史记》版本：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刻本（二十卷），见藏于辽宁省图书馆、苏州市图书馆、苏州大学图书馆、中山大学图书馆；明治年间（1868～1912）的铅印本（二十卷），首都图书馆、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。通过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主页（<http://www.nlc.gov.cn/>）进行检索，“万国史记”项下共出现8个条目，现将版本信息按年代排序如下（无刊年著录的置于末尾，参见表3）：

（表3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万国史记》

序号 索书号 版本概况

- (1) /72087 日本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铅印本，线装8册
- (2) /70845 上海申报馆光绪五年（1879）铅印本，二十卷，线装10册
- (3) /70477 上海申报馆光绪五年（1879）铅印本，二十卷，线装10册
- (4) /74235 上海六先书局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铅印本，线装8册
- (5) /71835 上海著易堂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石印本，线装6册（地图）
- (6) /71714 上海书局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石印本，线装6册
- (7) /10549:325-334 申报馆丛书（第325～334册）光绪年间铅印本，线装10册
- (8) /5888 上海申报馆清末铅印本，线装10册

表3中的（1）“日本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铅印本”，相当于《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》著录的“明治十二年（1879）刻本”，可惜该书漏载；从扉页“冈本氏藏版”判断，国家图书馆著录“铅印本”可能有误。其余7种均属于

华刻本，兹略述各本大要如下（序号按表3）。

(2) 上海申报馆光绪五年（1879）铅印本：10册合订成两本，版式与原版雷同，但第3跋名“书万国史后”改作“书万国史记后”，首册扉页“万国史记”下有“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”印，次页有“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印”。此本没有刻印年月，国家图书馆作“光绪五年”，不知何据（下文再探讨）。

(3) 上海申报馆光绪五年（1879）铅印本：除第1册首页有“松坡图书馆藏”印外，其余同（2）。

(4) 上海六先书局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铅印本：该本撤去原版扉页上何如璋的题词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把副岛中臣的题词从序前移至序后；首册第二页登载六先书局广告；第1跋作者“鸟尾水弥太”后增“撰”字；有“光绪丁酉年校印上海六先书局发兑”刊记。

(5) 上海著易堂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石印本：题词及跋文变动同（4）；“目次”后增“地球图”一页，是一幅相连的“东半球”和“西半球”地图，但仅残存半幅；封底左边有“光绪辛丑年九月十三日购于益记书坊共小洋四毛”字样。这是唯一有地球图的版本，是华刻本的创意。

(6) 上海书局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石印本：题词变动如（4）；“中村正直序”误刻成“中村王自序”；冈千仞序名“万国史记序”改为“万国纲鉴易知录序”；跋文3篇，第2篇“书万国史记后”、第3篇“书万国史后”统略作“书后”，并删去第2篇后的署名、纪年。

(7) 申报馆丛书（第325~334册）光绪年间铅印本：国家图书馆在“一般附注”栏内注云：“//申报馆丛书/（清）尊闻阁主辑一铅印本—上海：申报馆，清光绪年间，第325~334册。”核查实物，版式如（2）、（3）。

(8) 上海申报馆清末铅印本：在“一般附注”栏内注云：“11行27字，白口，四周双边单鱼尾，碑记题上海申报馆仿圣珍版印，编订名词馆藏。”“圣珍版”当“聚珍版”之误；版式同上。

上述7种华刻本中，申报馆占了4种，即（2）（3）（7）（9），这4种本子版式、册数均相同，怀疑是同一个版本。国家图书馆把（2）（3）著录为“光绪五年”，（7）作“光绪年间”，（9）作“清末”，有可能是误辨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即《万国史记》在日本刊印的同一年，颇令人生疑。

我们发现《申报》上有一则“印售万国史记”的广告，时间是光绪庚辰（1880）二月二十日，其云：“《万国史记》为日本人所译……本馆近从日本购来，悉照原本排印，且地名、人名另加标志，更仿点句勾段之例，俾阅者一目了然。……此诚天地间第一大文也。今已印竣，每部订成十本，收回工价纸料，洋六角。于月之二十一日即礼拜三出售。诸君子请仍旧购处所赐顾为盼。”这里明言申报馆的《万国史记》初印于1880年，看来国家图书馆著录有误。

五、华刻本的影响

为了论述方便，暂时把讨论范围限定为日本书籍的华刻本，对其涵义作一界定：（1）在中国首刻的日本稿本、抄本；（2）在中国刊刻的日本版本；（3）在中国刊刻的和刻本；（4）日本人在中国自行刊刻的著作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既然称“华刻本”，严格意义上仅指木刻书籍，但本文把铜版、石印、活字、景印的日本古书，取其广义也称作华刻本。事实上，木刻与木活字、铜版与铜活字等，只是印刷工艺的不同，北宋庆历年间（1041~1048）毕升已经发明“泥活字”，因此有些活字刊本比雕版刻本更早。和刻本既然包含“古活字本”，笔者以为把清代以前的刻本、刊本、景印本都归入华刻本也是可以的。

华刻本与和刻本一样，也不完全是原本的复制品（Replica），有些作了删改和增益，有些调整了序跋或结构，最紧要的是去除字里行间的日语音符（即训点、倒读符号等），我们发现使用日本原版的华刻本，工人在剝去音符时偶有疏忽，还会留下一些训点符号的痕迹。

以前述《万国史记》为例，华刻本不仅删去原版用以壮美的何如璋题词，去除中国读者不需要的训点符号，改变部分序跋的篇名、署款，而且把原版中出现的“皇国”改称“日本”，外国人名、地名采用中国约定俗成的译名（如“厄日多”改为“埃及国”等），甚至还有增加地图的。虽然这些多属翻刻时的变通做法，但也可看作是华刻本的创举。

《万国史记》因为多种华刻本而产生巨大影响，王韬在此书问世的当年游历日本，他在《扶桑游记》中盛赞冈本监辅的“《万国史略》搜罗颇广，有志于泰西掌故者不可不观，固必传之巨制，不朽之盛业也”。梁启超在《西学书目表》（1896年）中列出的第一本书就是《万国史记》，可见清人将之视为西学入门书的圭臬。

正如和刻本经历翻刻本、训点本、注解本等发展成评述本、图解本、改编本、翻案本而融入日本书籍一样，一些风行于世的华刻本，也通过节略、改编、摘录等形式融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去。

几年前在研读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时，发现该丛书辑入冈本监辅著书8种，即《西伯利记》、《印度风俗记》、《阿塞亚尼亚群岛记》、《亚非理驾诸国记》、《埃及国记》、《亚美理驾诸国记》、《美国记》、《墨西哥记》，但不见于其著作目录，查阅《国书总目录》也未得。当时怀疑全部摘自《万国史记》。现经周建高同学查实，事实确是如此。不过，王锡祺在节录时有所变动，如将每篇末尾的“论曰”一段全部删除，以合輿地书之体例；再如，原本以“我邦”自谓，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改作“日本”。

1896~1901年，鸿文书局石印出版《西学富强丛书》共48册，其中25~32册为“史志类”，收录了《万国总说》等5种。《万国总说》分上、中、下3卷，卷上题“冈本监辅（日本人）”，卷中和卷下则题“景东刘韞斋先生鉴定，皋兰朱可敬瞋庵著，长沙左宜锡九参”。经核对，卷上收录《欧罗巴洲总说》、《亚美理驾洲总说》、《亚非理驾洲总说》、《阿塞亚尼亚洲总说》、《印度记》5篇文章，均录自冈本监辅《万国史记》，说明《万国总说》（卷上）也是《万国史记》节录本。

中国人曾经利用和刻本复原了不少国内佚书，清代乾嘉学派得益有多。华刻本也有这方面的贡献，《七经孟子考文

补遗》的西传与东归，便是一个很好的实例。

山井鼎（1690~1728年）根据足立学校宋元古本校勘经书，1726年成《七经孟子考文》，将军德川吉宗嘉许之，又命儒臣物观补遗，1730年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竣工，次年镂版梓行，1732年将军命长崎奉行（地方长官）假商舶传入中国。

据翟灏《四书考异》，他曾于“乾隆辛巳（1761）”在杭州飞鸿堂的汪启淑家借阅此书，这大概是清人利用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校经的开始，此后卢文弨从鲍廷博处借得此书，用以校勘《周易》等。1772年清廷大征天下遗书，汪启淑独进600余种，包括这部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，后来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清代朴学大师阮元（1764~1849年），最初在北京获睹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抄本，及为浙江学政，从扬州江春处随月读书楼借来日本刊本，于1797年开板印行（题《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》），此即最早的华刻本。不久这部华刻本便经商人之手舶往日本。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《见闻书目》记载，仅宽政十一年（1799）、享保元年（1811）两年，就有约100部华刻本《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》传入日本，初传日本距华刻本问世仅2年，数量有如此之巨，实在令人惊讶。

“和刻本”与“华刻本”是中日书籍交流的产物，两者看似归属于不同国度的版本系统，但相互之间有着浓密的血缘关系，堪称“书籍之路”上的两颗耀眼的明星。